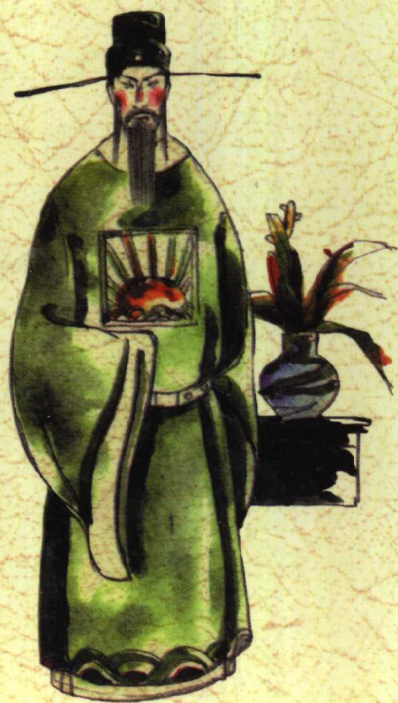


王宏石

勇
进
人
生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汤江浩 著



K825
10/2

王宏石

勇

进

人

生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汤江浩 著



00153525

SAE41/05

前 言

中华文明，数千年一脉传承。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如果说使国人骄傲，但近代以来，不如说常使人陷入困惑。很显然，久远的灿烂，倘没有厘清思想，清醒认识，是一种骄傲，也是一个包袱。这应当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反观历史，可以说，中国自康雍乾三代以降，中国君主政体的盛世荣耀收敛了最后的辉煌，俟后，洋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进入一种艰难的选择，中国文化陷入一种尴尬，中国人生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陷入一种迷茫。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无论是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还是“全盘西化”；无论是“五四”时期刚刚开始就中断了的文化启蒙，或是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运动与畅想，或是近年以来时而有之的所谓“一切向钱看”、“读书无用论”，我们常陷入一种思想的浮躁和行动的匆忙。应当承认，过分久长的历史确实给了民族某种重压，但我们已无法让历史负责任，相反，由于现实与心理的诸原因，传统又似乎成了一切不幸与灾难之源，因而常常成为众口一词的批评口实，这对我们也已是一段历史，或

者还要某种程度地继续。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也不能不认真去思考的。尽管这于我们国人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后来人似乎没有理由过分苛责前人。作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自己对自己负责，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及其未来负责。

似乎至少可以承认这样的认识，历史是人的历史，传统是人的传统。所谓历史与传统的辉煌，说到底都是人的辉煌，而所谓对历史的继承，说到底也是人对人的继承，或者说是后人对前人的继承，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后学对前贤的继承。另外，历史是以一种价值的形态确立其存在的。是的，能确立当时的价值不一定就能在未来产生价值，价值有其临时与历史的诸形态，这就是对历史的厘清，对前人的公正态度和全面认识。而于中华民族最见精英者当是她的圣贤人物。这又是历史的重心所在。从一种历史观言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最见功绩与风范的又必是其优秀人物。所以也可以说这就是圣贤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意义，这就是圣贤的思想、风范、功业，乃至其作为人的生命内蕴。从这个意义上说圣贤是不死的，也正因如此，一个民族只要她存在下来了，发展开来了，她就有着永远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这里尤其是民族精神，关于这一点不仅是理解的，更是存在的。自然，这二者在后来人或者更多的是一种发现。因为发现前人实际也是发现自己。这或者说就是我们组织、出版《中国圣贤人生丛书》认识与历史的原因。或者，说得更深入一点，中华民族的圣贤，与其所在的时世共创了一段历史的辉煌，同时也成就了个人的一份人生的灿烂。而与社会历史人生言之，历史是群体的活动，这就是民族与国家的文明史，但这所有说到底

又是以个人的集合而完成的。这样，焕发一个民族的精神落实下来就是焕发每一个个体的精神。这也就是圣贤人生于我们现实人生的意义。

而就一种社会选择言之，一切历史从文明形态上讲，只要它存在、发展，就必然要进入传统，乃至必然要继承传统，这样冷静地对待传统，刮垢磨光地发现传统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明规律。于是问题又回到同一个逻辑起点上来，历史是人的历史，这样，圣贤于我们就更见意义。而今天我们说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仅要心平气和地认识历史，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先贤先哲。就一种认识讲，民族进入发展的困难时期，又面临诸多思想与形势的干扰，乃至由之带来个体行为选择的困惑与忙乱，于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通达见地就特别重要。这既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注入《中国圣贤人生丛书》的期望，换言之，面对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而所谓走向世界，未来有时多少就显得有一点情绪化。所谓世界是世界的每一个部分的存在，每一个地域的存在，每一个民族的存在，每一个国家的存在，乃至由之产生的精神文化的存在。我们本来存在，甚至无须炫耀五千年历史，无须夸说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结论本来是现存的。重要的是需要一份冷静与清醒。

说到这里，关于这套大型丛书的由来、体式和风格，还须交代几句。

最基本的思考就是上面说的那些，但一定内容总是结合着一定的形式。而就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精神生产，在生动活泼的人的面前从来是没有确定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是说要出好《中国圣贤人生丛书》对我们来说

还要找到一个好的形式，并赖于这一形式，使丛书确实能给读者以教益。从对象说，中国圣者、贤者，其学说、功业、影响是确定的，但认识与表现他们却远不确定。这样，给读者以好的内容，又以一种好的形式就十分必要了。有些想法其直接后果就是本丛书第一辑的问世和所受到的华人世界读者的广泛欢迎。那么，这就是说从文体上说，《中国圣贤人生丛书》的文字，从单篇上看，是文化散文的，从框架上看又成传论整体。它不追求考证的索隐钩沉，却指望富有思想见地，又有文学的可读性；既见人世沧桑，劝世说世，又给读者以审美愉悦。因为圣贤也是人，这样圣贤之诸般人生情景于我们之读者，也就意味提供多般人生选择，也提供种种行为参照，甚而启示与模范，乃至一种诉诸恒定的道德良知的善恶判别。一句话，就是让读者深切地认识中华民族，认识活力永存、魅力不减的民族精神。这样从文本上说，一人一种书，一人一个点，但一个人一生是一个生命的世界，这样数千年历史，圣贤辈出，点点相联，这样我们就更大胆地指望，整个《中国圣贤人生丛书》能从人的角度构成一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学术史，乃至一部人情生动的中华民族英雄史诗。

关于“圣贤”一语，也在这里略作解释。就中国传统言之，是一个以伦理为治的国度，那么，圣贤是一种人格风范与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人的品格评价，其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但也恰是在这一点上，也常是见仁见智。而见仁见智，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君子与小人之争，说到底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圣贤一语的解证。在这里我们大抵关注才德两个方面，圣者则才德两全，贤者则更侧重于才能与事功，及其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标准

是需要的，但标准也常是难把握的。所以，就标准的把握，我们大抵从宽不从严。适逢丛书第一辑修订重版，后几辑开始启动，作为丛书策划人和作者之一的我，聊述初衷，缀于卷首，以求与读者交流，盼方家赐教。

田扬帆

1997年5月7日

● 目 录

前 言	1
临川王氏家族发迹史	1
王益宦迹寻绎	3
少年风采	5
王安石与曾巩诸友	11
小试牛刀	21
王安石与韩琦	37
王安石与范仲淹	50
天津桥闻杜鹃	72
《辨奸论》缘起	83
王安石与张方平	103
颊上三毛	112
王安石与商鞅	126
王安石断狱	142
宣德门事件	147
两位拗相公	151
王安石与东坡兄弟	183



君子与小人·····	213
义与利·····	238
西北战事·····	258
契丹割地·····	287
王安石与张载、二程·····	299
王安石与佛学·····	320

临川王氏家族发迹史

王安石的先祖本为太原人，不知何时，亦不知何故，迁居于抚州临川。安石的曾祖王明生有用之、贯之二子。用之乃安石之祖父，贯之为其叔祖父。贯之于宋真宗咸平三年进士及第，官至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时称能吏。父因子贵，故追荣其父王明为尚书职方员外郎。用之也可能因贯之的关系而步入仕途，官至卫尉寺丞。临川王氏的发迹，大约自贯之开始。

从贯之之后，王氏家族便成了诗书官宦之家。进士之花虽从贯之这一枝发起，后继者却为用之之子王益。王益即安石之父，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时年二十二岁。

王益，始字损之。十七岁时即以文章干进当时名公张咏，张咏甚奇其才，为其改字舜良。

王益先娶徐氏，后娶吴氏。徐氏生安仁、安道，吴氏生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

安石兄弟子侄中举情况大略如下：庆历二年壬午杨寘榜王安石，庆历六年丙戌贾黯榜王沆（安石从弟），皇祐元年己丑冯京榜王安仁，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王

*

安礼，治平四年丁未许安世榜王雱（王安石之子），熙宁元年戊申召试赐进士及第王安国。从咸平三年安石叔祖王贯之进士及第至熙宁元年安石胞弟王安国赐进士及第，其间六十八年，临川王氏家族登进士第者八人，可谓彬彬之盛。

王氏于宋神宗熙宁元丰间进入鼎盛时期，王安石兄弟七人，堂兄弟至少有两入；其子侄多人，曾巩《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载王安石子侄九人，侄女七人。王安石长子王雱，次子王旁。王雱亦有咄咄逼人之才，年十三即能议天下大事，未冠时已著书数万言。王安石执政，雱多有参议。《宋史》曾载安石曾叹新法为人所阻，雱即大言道：“桀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可见其少年锋芒。故《宋史》称之“桀悍阴刻，无所顾忌”。熙宁九年王雱病卒，时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之悲伤与痛苦可以想见。

王安石二子均无后，以棣嗣雱为过房孙。宋徽宗宣和四年以王棣为安石之孙赐进士出身，并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王棣之子琇、珏并转宣义郎。可见朝廷恩泽曾及于王安石子孙。

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王贯之中举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王棣父子蒙恩，计一百二十余年，王氏家族与北宋王朝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沧桑巨变。

王益宦迹寻绎

王益二十二岁举进士，得官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到任之时，由于年纪轻资历浅，不为吏民看重。然而数月之后即令举县刮目相看。人们对他既敬畏又爱戴，县令也十分倚重他。可知王益与其叔父王贯之一样很有吏才，既精明又厚道。

等到建安主簿任满之后，又被朝廷任命为临江军判官。临江军治所在今江西清江，辖境相当于今江西新余、清江、新干、峡江四县地。王益任判官直言敢争，不惧长官；对于喜欢打小报告的下级官员，更以冷面待之。当地有滩曰萧滩，腐旧之船，因水急滩险，往往不得过此滩。时人即以此滩比称王益为“判官滩”。王益因刚直爱民，吏民请之出领新淦县。

王益任临江军判官的时间，大约在宋真宗天禧年间。正是在此任上王安石降生于府治之内。天禧五年辛酉（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安石呱呱坠地，传说初生之时有所谓入室，故安石小字獾郎。辛酉属鸡，故安石吟诗多用白鸡之典。

王益出领新淦县，亦颇有政绩。后改大理寺丞，知

庐陵县，到县亦大治。后又移知新繁县（在今四川省），改殿中丞。初至新繁即纠治老牌奸顽数人，流放到远恶之处，其余人等均以恩信相待，数月即境内肃清。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知韶州（今广东韶关），改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当时韶州尚属不开化地区，男女无别。前任长官均以为风俗如此，不予干涉。王益至此改移风俗，推行中原教化，并“完营驿仓库，建坊道，随所施设有条理”。州里长老赞云：“自岭海服朝廷，为吾州守未有贤公者。”

居韶州三年，因其父王用之去世，故返临川故里守孝。三年服满，朝廷又除，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卒于任上，享年四十六岁，葬于江宁牛首山。

王益宦迹遍历南部中国。王安石自降生临江军府治之日起便随父亲的官署四方漂移。非独安石随父遍历宦所，往往举家老小皆随之宦游。这一方面因为家境贫寒，一方面因为王益为人孝友。王家发迹始于王益的叔父王贯之，王益虽年少中举，又甚有才干，但所历官职并不显赫，又不以聚财为意，故临川老家并没有置办许多产业，一家老小往往随官就食。只是到蜀地任新繁知县时不曾奉亲前行，主要因为路途险远，交通不便。王益自奉克俭，而奉养双亲十分大方，酒食备办得十分丰盛，甚至有人认为达到了奢侈的地步。王益对待子弟也十分宽厚，总以孝悌仁义细心劝诱，不曾大发脾气鞭笞子弟。王安石兄弟皆以道德文章名世，当与其教育和熏陶有直接的关系。王益久任地方官，王安石亦随之四方飘流，当对安石了解四方民情，体认朝廷得失及吏治状况，均有极大帮助。

少年风采

《宋史·王安石本传》于安石并无几句好言辞，然开篇即云：“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见安石才思敏捷，记忆超群，即使于安石抱有极大成见的人也不能否认。

安石《与祖择之书》有云：“某生十二年而学。”又《忆昨诗示诸外弟》云：“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精神流离肝肺绝，背血被面无时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安石之文已明言立志向学之年，安石之诗更是细致地描述了少年飘泊的行踪与情怀

的变化轨迹。安石从十二岁立志于学至二十二岁一举高中，正是十年寒窗苦读的结果。安石在这苦读阶段给他教益最多的应该是他的父兄。王安石幼年的行踪与父亲的宦迹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王安石十二岁时正是随父宦游韶州之时。王安石十二岁以前当已识字，王安石有诗云：“当我垂髫初识字。”其启蒙之师当为其父。安石的父亲王益十七岁即以文章惊人，二十二岁即一举成名。王益也是自视很高，颇有抱负的人，可惜不能重用于朝廷，王安石曾为其父感叹云：“其自任以世之重也，虽人望公则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呜呼！其命也。呜呼！其命也。”王益对安石的教诲、影响与熏陶，对王安石的成长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少年时的王安石即已见识广博，志向远大，才气横溢。王安石十三岁时随父归临川丁忧，三年之间大约主要致力于诗赋的学习，并已下笔不同凡俗，故颇为自得，“乘闲弄笔戏春色”、“坐欲持此博轩冕”诸句，可见其才华与志向。十六岁时随父北游汴京，即“丙子从亲走京国”所叙。十七岁随父宦居江宁，求学之意更切，用功更为勤奋，志向更为远大，所谓“端居感慨忽自寤”、“吟哦图书谢庆吊”、“欲与稷契遐相希”，可见惕励之情。十九岁时不幸父亲病逝，王安石奉母兄居丧。“精神流离肝肺绝”，可见其哀痛之情，然而王安石并没有因父亲去世而放松学习，这年他随从二兄入江宁府学为诸生，开始准备举业。二十一岁时守丧期满，服除，遂入京师应礼部试，次年三月即高中前榜。

王安石为何能一举成名，高居前榜？《宋史》本传有云：“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似乎王安石“擢进士上第”，主要依赖朋友曾巩

请当时文坛大腕欧阳修为他作了许多广告所致。关于曾巩在安石考试之前向欧阳修推荐安石的事，许多学者都作了考证，证明情况不属实。《宋史》此说实乃出自司马光《温公琐语》。不论此事是否出自司马光，王安石高中前榜并不是欧阳修造造舆论便能做到的。宋代科举考试实行糊名制度，并非名声大，便一定高中。梅尧臣是欧阳修的好友，又极有才名，科场并不得意。曾巩与欧阳修的友好关系无疑深于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曾巩的道德、文章也并不逊色于王安石，然而曾巩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始中进士（比王安石晚十五年），且曾巩长安石二岁，中进士时已三十九岁。欧阳修为何让王安石早早高中而让曾巩迟迟不第呢？曾巩中进士的这一年，正当欧阳修知贡举，在判文时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时的考官还有端明学士韩绛、翰林学士王珪、侍读学士范镇、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四人，另外还推举了梅尧臣为参详官。当时的考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在阅卷中发现了一篇从文辞到思想都十分优秀的文章，认为文风大似《孟子》，全场中以此文最为优秀。梅尧臣于是把文章拿出来和欧阳修等考官一起讨论。欧阳修也着实欣赏这篇文章，但他疑心这篇文章出自曾巩之手，曾巩是自己的门生又是自己的同乡，文中又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没有典事出处，害怕别人责问起来不好交待，故不肯听梅尧臣的意见评为第一，而使之屈居第二。后来录取名单公布出来，才知道这篇文章乃苏轼之作。若欧阳修不是疑心作怪，苏轼必定高中榜首。从此亦可看出曾巩这次金榜题名，也并不是欧阳修法外用情所致。这次录取的士子有曾巩、曾布、苏轼、苏辙、程颢、张载等在宋史，乃至中国历

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文章与当时士子们崇尚的险怪奇涩之文大异其趣，而是追求雄浑朴茂、典雅平正之风，故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趣味好尚相近。欧阳修改变录取标准的举措，在当时士子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落选的士子愤怒无比，有的人在他上朝的路上指着他破口大骂，甚至有的人为他写了一篇祭文送到他的府上。至此宋代科场的文风总算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次考官中韩绛、王珪都是与王安石于庆历二年同榜及第的“同年”。叶梦得《石林燕语》云：“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杨寘审贤榜王君玉珪，韩子华绛，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王安石、韩绛他们当年科场的取文标准，估计与欧阳修、梅尧臣等这番取文的标准有较大的差别。可以猜想王安石当时博取功名的文章，与他后世流传的宏文必定亦有较大的差别，故其诗云：“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王安石在进士录取中也有一段与苏轼相类的轶事。王铎《默记》载云，安石原本取中第一，后因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宋仁宗因忌此语，故临终把他与原取第四名的杨寘对调了名次。王安石与苏轼，或因君主的忌讳，或因大臣的疑惧，未能状元及第。他们都在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以文章轰动京城，从此揭开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庆历二年三月，王安石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登科。《宋史》安石本传谓“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乃把安石擢上第的功劳记到了曾巩、欧阳修的头上。前文我们已辨《宋史》所云不实，